

怀疑主义者、“孤独者”与尴尬一代

——从代际关系考察当今文学发生的异同

“60 后”:文学的怀疑主义者

如果考察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特点,就必须将其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做一个比较。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他们虽然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一段历史,内心受到严重的创伤和改造,但是他们骨子里的时代观还是相当完整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也相对清晰,充满了激情。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是在“文革”的废墟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童年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刻,即所谓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因此,他们的小说至少在写作初始,基本上是以童年这个视角来认知世界的,在他们的面前是一个政治的信仰的激情的大废墟,一个无法拼合的破碎的世界,一个断裂了的历史,从这个起点来开始写作,他们便成了真正的怀疑主义者。

十多年前,我与诗人黑大春和已故散文作家苇岸主编了一套《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我负责小说卷,书中收入余华、苏童、格非、陈染、北村、关仁山、须兰、述平、孟晖、吕新等十位作家。在这些作家中,余华应该是“60 后”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他的小说多半是借助童年的视角,表现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残忍。他通过一种颠覆性的语言表现那个时代的异化和荒诞,从他的《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后来的《兄弟》,我觉得他的艺术思想是始终如一的。而苏童更多的是用一种哀伤的调子记录着自己童年的历史,同时又恢复和猜测着更久远的自己经验之外的前历史。格非则借助语言和形式怀疑并且重新构建了一个迷宫式的文学世界。这十位作家中的数位今天都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作家。当然还有书中没能入选后来影响较大的几位作家也值得关注,比如徐坤、韩东、毕飞宇、迟子建、邱华栋等等。徐坤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作家,她用“女权主义”和“王朔式的幽默与反讽,表现城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荒诞和迷失,被王蒙戏称为“女王朔”。还有一个新近引起关注的作家叫于千万长,他是蒙古族,却客居深圳,他也是通过对童年的追溯来表现他梦幻中的、回忆中的出生地——几千里之外的边地草原。看他的《长调》,再去看他所描述的草原,你会很失落,现在可能根本已经找不到那样的绿色和草地了,那只是他童年回忆中的草原,或者说他魂牵梦绕中的草原,因为这个草原已经不复存在了,至少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已经破碎了。

“80 后”:孤独中的反叛与认同

我形容“80 后”作家是“外星人”,我们用常理或者用传统文学理念是很难把握他们的,无论是写作还是为人。我在评论张悦然的小说《誓鸟》的一篇文章里,说她写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人”,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他们这一代是在商业大潮的环境下迅速疯长起来的,而且他们一出生就可以接受完整系统的各种门类的知识。这一先天优势无论是“60 后”还是“70 后”作家都无法比拟。我经常嫉妒地对他们说:不靠谱的“80 后”。这不

是贬义词,不靠谱地写小说也许才能写出独特的小说。但是为人还需靠点谱,这是我对“80 后”的忠告。他们中的有些人常说:我不会对我之外的任何人负责。这从做人的角度上看挺可怕的。

张悦然是我一直关注的作家,评论家邵燕君写过一本书《“美女文学”现象研究》,说韩寒是另类、叛逆,郭敬明是奇思异想,而把张悦然称为“玉女作家”,我觉得不尽然。张悦然的小说对女性、对自我、对身体的认识和理解,带有很多生冷孤傲的东西,而这种生冷孤傲,又归结为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比如她的《誓鸟》,主人公春迟在南洋为了等待她心目中的男人,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她只能通过触觉和心灵的感悟来继续寻找,寻找那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或者根本不存在的男人。寻找和漂泊构成了小说悲剧的主题。实际上她是通过自虐的方式,或者一种牺牲的姿态来面对和感化这个男权社会。她在《青年文学》上有一个短篇《少儿不易》,写一个女孩 20 多岁了,却是一个侏儒,形体和面容像 8 岁的孩子。她无法像大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和恋爱,别人甚至做爱都不回避她。她非常痛苦,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她每天站在村口,等待人贩子来把她拐走。她感觉,有人买我,就说明我有用。她通过这种受难的方式,来表达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诘和超越。她最近主编一套主题书叫《鲤》,主题分别是孤独、嫉妒、流言、暧昧等。其中有一篇《自残》的文章,写一个女孩割腕的过程非常详细、冷静和坦然,那种奇妙的体验令人震惊。她看着鲜血从皮肤上流过感觉自己很纯洁,她感觉有一个灵魂住在血管里,也许会从这个伤口里走出来。她说这是她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但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本能的孤独感。“80 后”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孤独”应该是“80 后”的一个与生俱来的主题;还有“嫉妒”,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任何另外一个人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的,而“暧昧”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谎言”应该是他们创作和观察处理事物的艺术手段,也是他们反叛前人的策略。总之,这几个主题恰好契合了“80 后”整体的写作和心理状态。

“70 后”:尴尬的一代

“70 后”是尴尬的一代。前一段某个媒体搞过“70 后”作家排行榜,第一名是李师江,第二名是冯唐,第三名是尹丽川,还有丁天、金仁顺、朱文颖、魏微、李修文、盛可以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作家,但确实是尴尬的一群人。首先他们很难完全摆脱“60 后”作家的影子,而且在他们创作初期还是以女性为主体。记得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北京文学》杂志组织“70 后”作家的笔会,找个男作家非常难,只有一个丁天比较突出,我戏称他是娘子军里的指导员。另外他们刚刚引人注目,就遭受到了挫折;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被查禁和点名。虽然这两部小说不能真正代表“70 后”的整体水准,但却是对“70 后”作家的一个整体打击。而等他们准备咸鱼翻身的时候,“80 后”却突然浮出水面,且锐不可挡。所以“70 后”是夹在两个代际之间。“60

文学批评

后”有地位、有资历和成就,“80 后”有读者、有商业价值,而“70 后”的商业价值,目前来说是最低的一代。当然也有几位既具有商业价值,又写得较好的,比如安妮宝贝、李修文等。最近又有一个叫路内的作家,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我读他的小说感觉他更像是传承了“50 后”作家王小波衣钵。王小波作为具有众多拥趸的作家,虽然门下的“走狗”很多,可小说的后继者却几乎断了香火。路内应该是从小波的影响下走出来的作家,只不过他写的是九十年代初那个时代,他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迷乱和躁动,颇受“80 后”作家的推崇,代表了“70 后晚期”作家的风格。我最近看了他两个短篇,其中《无人会眺华尔兹》(见张悦然主编的《鲤·暧昧》)写得很精致。李师江原本是个极端另类的作家,他早期的长篇小说《比爱情更假》和《她们都挺棒的》在反叛的意义上走得很远,但是近年他开始皈依传统,写了《福寿春》《幸福之洲》这样纯土土纯写的作品,这或许可以看作“70 后”作家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喧嚣与寂寞,经过沉淀和自省之后,开始收获的一个征兆。

“70 后”的女作家曾经被统称为“美女作家”,上海的《小说界》杂志最早开设的“70 后作家专栏”里就是以女作家为主,而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吉林的《作家》杂志在 1996 年出的一期专刊,将“70 后”女作家的玉照和作品一并推出。“专刊”的最大功劳是推出了两位至今还很活跃的作家,一个是金仁顺,当时她还没什么名气,后来却写得越来越好,还有魏微,当时她的作品也不能算出类拔萃,但是她后来非常努力,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去年在台北,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的“70 后”女作家胡淑雯,她的小说集《哀艳是童年》我非常喜欢。她的小说表面看来是很私人的叙事,但是透过这些私人化的经验,我们能隐隐读出她对整个时代的关注,比如性别争议、族群关系和社会阶级等问题。《鲤·孤独》中曾选过她的《浮世猫》,其中展现的男性与女性权力与地位的转换让人惊异。朱天文在评价她的小说《与男友的前女友密谈》时说:“(小说)既辩证,又感情深邃,两种相异的气质,做了一次无解可击的动人的演出。”

安妮宝贝也是个“70 后”中值得研究的作家。很多传统作家和传统的评论家对她不以为然,但是她的影响力令人刮目。记得有一次我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文学奖的颁奖会,会议主持人介绍来,在座的都是国内文学领域的大腕,当介绍到他们时,掌声稀少,而到安妮宝贝的时候,后排大学生观众都齐刷刷地站起来热烈地鼓掌。我很吃惊,也有些不解,但是后来认真地读了她的作品,我发现她确实代表了相当一批年轻读者的心声。日本有个女作家吉本芭娜娜,她的小说在日本被称为“疗伤小说”,读者众多。安妮宝贝的小说似乎就具备这样的功能。她是一个孤独且异常敏感的人,她的写作似乎就是通过表达来为自己疗伤,使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慰的同时,又抚慰着与她心灵相通的那一部分读者。她的《告别薇安》《莲花》都是我喜欢的作品,她的小说对“80 后”作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评论

才情并茂说弘征

□聂鑫森

创作的旧体诗词的精选本,不少篇什是第一次公之于众。入选此集最早的是写于1954年的七绝《汨罗怀屈原》:“屈子行吟何处寻,汨罗江畔卷涛声。留得后人同一哭,清流有幸葬诗魂。”

我读此集,第一个印象是他的许多作品,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重大事件,同时态地通过个体生命的体验,艺术地予以反映,有独特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更无口号、板框式的粗俗、浅露。他细心而机智地营造诗的意境,注重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讲究练字锻句。如写反“右”风潮的《己亥春感》,写文化大革命的《丁未春感》,以及写改革开放后诸多领域崭新气象的篇章,在氤氲的诗意中,见性灵,见思想,感染力极强。“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到处充满生机。出山后的弘征兄,用一双诗人的眼睛,敏捷地捕捉着细微处所凸现的巨大变化,并发自内心地引吭高歌。如表现读者争购新刊古典文学图书的《庚申街头所见》:“李杜千年骨早尘,尚留遗韵绕苍穹。新除四旧秦烽火,未绝斯文一例同。”由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想到“文革”的破四旧,而又怎能割断中华民族深厚、悠久的历史传统!弘征一生待人诚挚,珍视友谊,广为交结,即便在生存状态艰难时亦如此,这在中集随处可见。师友中,既有文坛巨匠的巨擘,如夏承焘、钱君匋、林散之、程千帆(雨堂)、黎泽泰、秦粤生、黎雄才、沈从文、汪曾祺……还有儒雅擅诗文的资深领导者、故里乡贤邵汉。酬答之诗,既要体现对方的身份、性格、学养,又要勾勒出两人的交友轨迹、特殊场景中别有的意绪,殊为不易。弘征却能举重若轻,足见他功底之深厚。

1982年5月,他陪同沈从文等人游张家界,口占八首,其二云:“漫道诗窗窄且暮,秦宫汉阙早成灰。珠玑万斛天机锦,已谗文林万古碑。”沈老自题所居曰:“窄且暮”,可见这位作家生活之艰辛。位高权重者灰飞烟灭,他的文章却不朽,诗人的软儒和赞词溢于言表。

1983年在《钱君匋翁来湘举行艺展有赠》中,诗人

人的故事,张洁描写了人生的种种境况,流露出浓重的沧桑之感。作品构思别致,总能制造一种距离感,先把读者推远,然后再一步步吸引过来——无论故事发生在何人何处,毕竟人生相似、人性相通。这里的每一篇小说,都透露出张洁刻意追求的人生境界和写作理想。

一起拯救中国虎

《华南虎日记》(全莉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记录了一个女人与她的团队顶住多方压力,坚持野化华南虎的过程。这个艰难而奇妙的故事,

评价了钱虎的名声、成就、品德、性灵和遭遇际遇,造语工新,准确而生动。

弘征在短短的酬答诗中,往往注重细节的撷取,一语而令人物鲜活。他曾陪作家汪曾祺、谿客游桃花源,桃花源中的擂茶令汪老动情,且对当地的酒与沅江鱼亦赞叹有加。弘征诗云:“难得携书游结伴,幽林留醉且倾壶。余香共赞擂茶好,更喜沅鱼味胜鲈。”而汪老在和诗中,也说“与君安坐吃擂茶”。1997年,汪老辞世,弘征于伤感中写下《悼汪曾祺翁并步前赠原韵》:“感君高义到长沙,正是枫红二月花。今夕悄然吟昔句,恨难同再对擂茶。”因擂茶是一种极具民俗意蕴且有地方特色的茶,正如汪老与弘征的处世为人及美学主张,弘征反复使用这个细节,其意深长。

弘征于旧体诗词创作,可说是轻车熟路,且有卓识。此集中的《论诗绝句十九首》,在友人中早已广为流传,并得到认可。他的组词《忆江南·长沙好》,多年来就为一些名家所称赞并唱和,可说是慧眼识珠。弘征的旧体诗词,讲究思想性、艺术性,全力凸现诗的潜质,平仄、对仗、押韵皆在法度之内,货真价实,决非“野狐禅”,故颇值珍视。

弘征在《跋诗》中说:“半生漂泊苦吟程,少小曾邀举座惊。漫道文章如路草,更行更远更还生。”我相信他在这方面,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正如萧湘雁所赞誉的:“骚坛涌出性灵诗,夺取霸风第一枝。”《弘征书法》,由中央美院教授、书画家朱乃正作序。弘征习书,自童蒙始,至今犹挥毫不止,真、草、篆、隶,四体皆备。朱序云:“自古传世文人皆善书,历代成大家者不胜枚举。……弘征兄于长期编著之余,或吟诗,或治印,或临池,积数十年秋之功,互为融渗,蒙养日深,其书法虽无意炫于书坛,然细品其楷、隶、篆,可识弘征兄之才学情性。”诚哉斯言!弘征的楷、篆、隶,沉稳端庄,清朗持正;而行、草,汇入秦汉简牍的笔意,更显劲捷、开张与舒放,是我极为钦服的。

弘征汲汲于书道,而且自成一番面目,源于“初始无意作书家,更无跻身市利之妄念,只是心所钟爱,情所系之,浸淫其中而乐此不疲,遂有春华秋实之获”(朱序)。先是做工,后为编辑,这是弘征的正业,而读书、作文、吟诗、治印、临池,皆是业余所为,无论是他的平民视角,还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吐纳,在不经意间对文学、艺术的主流,保持着一种可贵的“距离”感,又因这种“距离”感而成为他文学、艺术的个性与魅力张扬的磁场,令许多专业于斯的人汗颜。

寄托了中国人拯救一个古老神奇物种的梦想……

中国虎在南非多年的野化训练日志,记录了从第一代小虎踏上南非本土的那一刻起,经历了种种磨难,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中生活,比如难以忍受的持续高温、暴风雪与蝗灾,更别提那些意想不到的遭遇——一只凶猛獠牙的撕扯,一只难缠的乌龟、一条巨蟒、野马以及遭遇奇特的豪猪等棘手情况!最后成功地习得了必要的生活与狩猎技能,从而得以在野外生存,并且相继繁育出了优质的第二代小虎,而第二代小虎又在母虎的带领下学习如何在野外生存和狩猎的技巧等诸多精彩故事。

耐读的萧殷

□黄廷杰

关注

元旦接2009年最后一期《文艺报》,读到李朝全《文学呼唤名编辑》一文,文中作者感叹:“好编辑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一个似乎被人淡忘了的名字遑涌心头,萧殷。

《鲁迅日记》(1936年10月9日)载:“得肖英信并稿”。肖英即萧殷。景仰鲁迅的21岁的萧殷万万没想到,10天后等来的却是鲁迅逝世的噩耗。然而,萧殷终其一生实践的正是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作为饮过延河水的战士萧殷,忠诚于党的事业;作为作家、评论家的萧殷,服膺真理、固守良知,将毕生精力耗费在文学青年身上。

1956年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围剿,萧殷独具胆识,公开为作者辩护,著文在《北京文艺》发表。1961年,为批判极左思潮、庸俗社会学,纠正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批评方法,他率领广东理论工作者,在《羊城晚报》上展开一场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于逢著)的讨论,《文艺报》转载了《文艺批评的歧路》等三篇文章,产生全国影响。1965年秋天,周立波的散文《韶山的节日》在《羊城晚报·花地》发表,因文中讴歌杨开慧,触怒了江青,上头发难下来,然而,由陶铸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其辖下的《羊城晚报》不妥协,1966年初,又将小作订正的《韶山的节日》重新发表,编者按语执笔者,便系萧殷(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处长)。1972年,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假清远县办大型写作“学习班”,萧殷针对所谓“三突出”,作了有关创作规律问题的报告,有人五次上书“中央首长”告密,隔年,萧殷便成了“文艺黑线回潮复辟”的“典型”。萧殷解放前曾两度与张春桥共事,有好心人劝他:是不是给张写信消灾?萧殷就是萧殷,坦然面对“黑”到底!

我曾在追思文章中称“他为别人而活着”。白桦的第一篇小说、邵燕祥的第一首诗,都是经萧殷之手发表的,称“我的第一恩师是萧殷”的王蒙,当年因被错划“右派”致《青春万岁》出版搁浅,清样则一直保存在萧殷身边。萧殷夫人陶萍生前回忆“十年浩劫”时曾说:“它已成为我家惟一的一本文学书籍。”当年,萧殷主持《作品》编务,发现工人作者陈国凯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部长下棋》遭《作品》退稿而在《羊城晚报》发表,由是,“抽查退稿”便成了萧殷的“专利”。1983年临终前,他还记挂着陈国凯的入党问题……

萧殷几十年如一日焚膏继晷,甚至住院躺在病床上,都在为年轻人的文章“把脉”,故没能写出更多像《桃子又熟了……》那样的力作,没能 在理论方面实现突破、创新,自成体系,甚至连酝酿多年的《创作论》,也没能完成,不能不说是人生憾事。然而,这也正是萧殷生命价值、典型意义之所在!

萧殷门下也有不解者在1989年底著文说及,“我很难想象,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文学作者,都和萧殷建立了有稿必看、有信必复的通信关系。看了最近一期《特区文学》的《萧殷书信集》,黄廷杰的信占了很大位置……”

读人最是读境界。将军作家吴有恒在《萧殷文学书简·序》中说萧殷是个好心肠的老头。作家马烽有句非常生活化的话:萧殷“不看人下菜碟”(《致“纪念萧殷同志逝世十周年暨萧殷文艺思想研讨会》)。言“很难想象”,没准来真正读懂萧殷。

我有幸认识萧殷于1972年,那是他门庭冷落时。我与他通信,从1975年下半年始到1977年下半年计11封,其中就写问题讨教数二。在他恢复工作四年多后的1982年春节前,又通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萧殷师回函:“去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病痛中度过……体质一天不如一天……来稿来信仍很多,可是再没有精神处理了……这一病之后,潮汕之行愈来愈远了……”我最后一次拜访他,也是在这一年的阴历三月天。萧殷逝世后,有关纪念出版物有《萧殷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2月版)、《萧殷论》(贺朝著,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8月版)、《萧殷传》(贺朝著,花城出版社1993年4月版)、《萧殷文学书简》(花城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风范长存——萧殷纪念与研究文集》(广东省作家协会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共计169万字。这也是先生身后的丰碑!

萧殷是属于广东的,也是属于中国的。萧殷只有一个!

■新作快评

照入生活的一缕微光

□予犀

梁晓声《回家》,《北京文学》2010 第2期

梁晓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等,构成了我们一个时段重要的文学记忆。但近年来,却较少能够读到他的短篇作品。我以为,这和他的文学观念正经历着某种裂变有关。在他的短篇新作《回家》中,我找到了答案。我感到梁晓声强烈地介入现实,提升现实的渴望。用席勒的话说,梁晓声的这篇作品就是一首“感伤的诗”,他试图把现实提高到理想的高度,让人重新体认到善良和信任这些美好的价值。

小说发生的空间被设置在一条路上。众所周知,路,一向就是一个凶险的空间。《水浒传》里好汉,稍有不慎,就会在路上被麻翻;《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少年,也是在路上遭遇到不测的劫难。梁晓声,却翻转了人们对于路的想象,让这条路回家之路,在猜忌和善意构成的矛盾中,有惊无险。小说的主人公叫羊子,是一个从乡下来深圳打工的女孩。春节放假,商场方面要求她随身携带价值30万元的钻石,送到离她家乡不远的雅安分店。哪知到成都的飞机晚点,无奈之下,只好坐上一辆黑车。司机看起来非常狡猾,同行的两个乘客,一男一女,男的长相彪悍,还提着一个装有杀猪刀的黑色塑料袋;女的也来者不善,与羊子拌嘴。可以说,到了这里,我们发现,这篇小说已经具备了一个通俗的公路小说的全部要素。按照程式,下面就该斗智斗勇,互相残杀,展开生死角逐了。但是,我们发现,梁晓声却只是戏仿了通俗的公路小说的形式而已。他不动声色地控制着叙事的节奏,让小说发展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四个人之间虽然也互相猜忌、防范,谨小慎微,但最后的结果却都是为了保护羊子不受伤害。这就彻底地解构了通俗的公路小说。我们经常看到通俗文化对崇高价值的解构和奚落,如今梁晓声却以彼之道还诸彼身。这种有趣的创造是值得玩味的。

另外,梁晓声这篇小说与时代之间构成的张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抛开语境来谈这篇小说。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路”型社会。在路上相遇的都是陌生人。现代的社会生活,本质上就是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交错,如果信任不存在了,现代社会是难以展开其具体的运作过程的。我们每个人都以感受到,现在有许多许多的事件都在破坏着我们内心里本来就很脆弱和窄小的信任空间,比如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这毫无疑问是对公民信任感的滥用,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信任的瓦解和社会的脱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梁晓声的这篇小说,才显出自己的价值。它是对信任的想象和修复,是对善意的挖掘和高扬。在创作谈中,梁晓声说:“依我的眼看来,我们中国人当下生活,暖意渐少……若论揭示人性之丑恶,我自忖,自己远比不上同行们的犀利与深刻……于是便想到了善和温暖”。应该说,这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一种写作伦理。

在我们的文学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伦理趋向。凡是书写恶的荒诞的,都被认为是深刻的;凡是书写善的和美好的,都被认为是浅薄的。在笔者看来,这是和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而这又离不开西方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建立起对人性的信心,不仅对存在的暗面有所观照,对亮面也应有所洞俾。席勒所说的“感伤的诗”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的,对现实的想象性提升,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梁晓声营造的这条充满善意的公路,可能有太多的理想成分,但它终究是一束照进生活的光亮,多一些这样的光亮,又有什么不好呢?

本版责编:刘 颖 饶 翔